

后突厥与突骑施交战地点考

芮传明

约一百年前在蒙古高原上相继发现的古突厥文碑铭(其中有一小部分用汉文镌写)“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噉欲谷碑”等三块大碑和其它几块较小的墓碑,记载了有关后突厥汗国(7世纪80年代至8世纪上半叶)若干领袖的显赫武功,内容涉及到后突厥汗国的历史、军事、外交、文化、地理和民族构成等各个方面。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些碑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在某些问题上仍旧未取得一致意见。例如,对于后突厥与突骑施关键性一战的战场方位便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本文即拟就此问题作一具体的考证。

一、关于交战地点的各种异说

敦碑第35至36行记道:“我们翻过无路可走的阿尔泰山,渡过无渡口的额尔齐斯河。我们连夜前进,于黎明时抵达bolcu。人们捉住了‘舌头’,他的话是这样的:‘在yaris平原上已集合起十万大军。’”第39至42行记道:“我们进攻并击溃了〔敌人〕。第二天他们〔又〕来了。他们如火一般猛烈扑来。我们交了战。他们的两翼比我们多一半。由于上天保佑,我们没有因其人多而害怕。我们交了战。达头设参战了。我们击溃了〔他们〕,俘其可汗,将其叶护和设在那里杀死。”阙碑东面第36至37行写道:“那年为征讨突骑施,我们越过阿尔泰山,渡过额尔齐斯河,袭击突骑施人于睡梦之中,突骑施可汗的军队如火似飙从bolcu而来,我们交战。”毗碑东面第27至28行则云:“那年,为攻打突骑施,我翻越阿尔泰山,渡额尔齐斯河。我袭击突骑施人于睡梦之中。突骑施可汗的军队如火似飙而来。我们战于bolcu。我在那里杀死其可汗、叶护、设。我在那里获取其国家。”可见突厥人与突骑施人交战的主要地点当是bolcu或其附近,而突骑施屯驻大军的地方则是yaris。但是关于yaris和bolcu方位的比定,历来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前一个地点在碑文中写作yaris yazj。yazi义为“宽广开阔的平原”亦即相当于英文的plain。人们无一例外地把yaris yazj称为“yaris平原”,并且多数人把它视为是某一河道所流经的平原地区。丹麦学者汤姆森(V·Thomsen)疑yaris为今苏联西伯利亚境内鄂毕河的支流查里什(Tscharisch),也就是将“yaris平原”视为Tscharisch河流域。日本学者岩佐精一郎认为,yaris乃是新、旧《唐书·苏定方传》中萧嗣业在追踪阿史那贺鲁的过程中所经过的“邪罗斯川”,此河当是今新疆伊宁东北的博尔塔拉河,此说是将“yaris平原”视作博尔塔拉河流域了。法国学者古罗(Rene Girud)肯定地把“yaris(yarich)平原”视作今准噶尔平原:“无论发生在两次战役的具体战场如何,它肯定是爆发在‘yarich’平原中,毫无怀疑,此平原就是准噶尔。”古罗显然未

将yaris看成是一条河流。我国学者岑仲勉先生的看法是，yaris即是注入今阿拉湖北岸的雅尔河，即把“yaris平原”当作雅尔河流域。

关于bolcu，汤姆森未能比定之，只是说“西突厥地方之一地名，地望尚不明（西突厥或突骑施之首都？）”。吉罗的比定要具体而肯定得多：bolcu很可能在今乌伦古河注入乌伦古湖的附近，并且，“根据各种迹象来看”，bolcu是指一座城市，该城可能相当于现在的福海（位于乌伦古河口的北岸），岑仲勉则疑旧雅尔城东约三百余里的博齐勒尔河即bolcu。

汤姆森对于yaris的比定与史实过于抵牾，盖按汉文史料所载突骑施的主要据地决不可能向北远至鄂毕河的上游地区，此外，以Tscharisich对应yaris，于语音上似也勉强。至于吉罗将yaris平原比定为准噶尔平原，既无语音上的根据，也不符合游牧人大量军队必须屯驻在水草丰盛地区的惯例。所以，比较可取的是想仲勉的比定。尽管他把yaris视为《唐书》中的“邪罗斯”是不确切的；尽管他并未具体而令人信服地考证其“yaris=雅尔，bolcu=博勒齐”的比定，但是我认为此说较为合理。下面将就地理形势和语音对应等方面予以考定。

二、战争的具体过程述略

我们首先必须认定这场战争的某些具体过程，因为这些细节与地名的比定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阙碑和毗碑提及的对突骑施的征讨肯定是指同一件事，因为前者称此战发生在阙特勤26岁时，后者称发生在毗伽可汗（即“达头设”27岁时）。既然这弟兄两人相差一岁，且两碑的措辞几乎完全一样，所以，说毗伽可汗和阙特勤同时率领同一支部队出征黠戛斯和突骑施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敦碑所述敦欲谷之征讨突骑施是否与毗伽可汗和阙特勤同时？

敦碑关于敦欲谷“西征”的事迹载在第19至48行，其大致内容是：3敦欲谷听到黠戛斯、突骑施和中原王朝准备三方合击突厥的消息后，决定先击破黠戛斯。于是率军长途奔袭，歼灭了黠戛斯军队，并回师突厥西部境内。接着传来突骑施大举出动的消息，可汗在交待军事首领们小心提防后就返回了中央根据地。最后，敦欲谷坚持主动出击，终于以少胜多，打垮了突骑施。随后他又南渡珍珠河（即今锡尔河），直抵铁门，粟特人也臣服了。根据汉文史料《通典》《旧唐书》和《新唐书》的《突骑施传》，景龙三年（709），突骑施可汗娑葛之弟遮弩因为怨恨所分得的部落少于其兄而叛入突厥，愿为向导讨伐娑葛。时在突骑施和唐廷和议之后，即在是年的秋天或冬天。另一方面，唐廷在景龙四年（710）五月十五日颁发的《命吕休璟等北伐制》中要求突骑施和坚昆（即黠戛斯）与唐军一起合击突厥，并追述了突骑施与坚昆早有这种企图：“坚昆在右，特角而东，并累献封章，请屠巢穴。”

所以突厥完全有可能在709年秋、冬因为得悉突骑施、坚昆、中原三方合围的企图以及恰值遮弩来奔才发兵西征的,这与敦碑所述完全一致。按敦碑的描述,敦欲谷奔袭黠戛斯之战发生在严冬,故当为709隆冬或710年早春。然而,敦欲谷在征服黠戛斯后“回师”,并“住在阿尔泰山”,足知突厥军队曾隔着阿尔泰山与突骑施相持了一段时期。按汉文史料,突厥在711年一年中与中原的和亲通好活动频繁。魏知古在711年夏末的上疏中仍担心突厥“在和亲际会,倘或窥犯亭鄯,国家何以防止”,充分表明至少迄于此时,突厥与突骑施仍在相持着。又,按阿拉伯文史料,阿拉伯军事首领屈底波是在712年春天兵围粟特重镇撒马尔罕,从而迫使粟特人向锡尔河北的突厥等政权求援的,那么敦欲谷之征服突骑施就必定在711年冬天或翌年春天了(据敦碑,敦欲谷是在征服突骑施后旋即南下索格底亚那的)。

这即是敦欲谷所率突厥军队出击突骑施的时间表。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毗伽可汗与阙特勤的部队并未和敦欲谷同时抵达突骑施,其时间略有先后。兹简述理由如次。

首先,敦碑谈及,可汗听说突骑施结集大军后,便吩咐道:“你们驻扎在阿尔泰山!让小可汗(inal qaghan)及达头设作军队统帅,(率军)前进!”(第31行),下文又说,可汗给阿波达千秘密送去消息说,“敦欲谷是个坏家伙,他心怀叵测。如果他说‘我们出兵吧!’你们不要同意!’听到那些话后,我(指敦欲谷一一引者)令出兵了。”(第34至35行)。可见驻扎在西线与突骑施对盼的突厥军队至少分成三大股势力:小可汗、达头设(即毗伽可汗)与敦欲谷。他们相互间的独立性较大;事实上,据敦碑来看,敦欲谷最后违背可汗意志擅自出兵时所率领的也只可能是自己的嫡系部队。简言之,他并未与达头设同时出发前击突骑施。

其次,尽管按阙、毗碑的叙述,毗伽可汗(达头设)与阙特勤有可能也在711年隆冬或712年早春率军前击突骑施。但两碑都声称他们是在袭击黠戛斯之后的同年紧接着攻击突骑施的。也就是说,他们并未象敦欲谷那样直接翻越阿尔泰山进攻突骑施,而是从黠戛斯绕了个圈子再抵突骑施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征讨突骑施的时间和路线都不可能与敦欲谷完全相同。我们只能说,敦欲谷与达头设(毗伽可汗)分兵共击了突骑施。

三、战场位于塔尔巴哈台地区

一旦确认了这样的史实,我们便可以解释碑文中的一些似乎矛盾之处和若干细节了;而这些细节有助于我们确定这次战场的方位。

敦碑第41和42行说,敦欲谷“俘其可汗。将其叶护和设在那里杀死。”阙碑东面第38行说,毗伽可汗与阙特勤“杀死了他们的可汗,取得了他们的国家。”一“俘”一“杀”,孰是孰非?实际上,这可以用突骑施之分成

“黄姓”和“黑姓”部来解释。按《新唐书·突骑施传》，突骑施“种人自谓娑葛后者为‘黄姓’，苏祿部为‘黑姓’，更相猜仇。”可以推想，如果敦欲谷和达头设同时分兵进击，则肯定是敦欲谷先与突骑施交战，因为达头设（毗伽可汗）尚需先袭突骑施的盟军黠戛斯。因此敦欲谷所遇到的敌方首领应是统帅整个突骑施的可汗娑葛。汉文史料谓突厥曾生擒娑葛，这与敦碑所述吻合，亦即是说，敦欲谷生擒的是出身于“黄姓突骑施”，即当时执掌突骑施部落联盟大权的娑葛。另之方面，在此处，若并不按通常的解释，把qara作为“普通”解，而是取其本义“黑的”，那么无疑可将qaraturgis译为“黑姓突骑施”，从而使阙碑东面第38行成为“我们杀死了他们的可汗，取得了他们的国家。黑姓突骑施人民全部归顺了。”按此文义，显然可解释成毗伽可汗与阙特勤所杀的“可汗”实际上只是黑姓突骑施的首领，而非娑葛。其实，统观阙碑，毗伽可汗和阙特勤所与之交战及事后不断摩擦的突骑施人，也只是qara turgis，即黑姓突骑施。敦碑第41行：“（我们）驱散了（敌人），追迫他们趋向于达头设。”一语很好地表达了敦欲谷基本上只击溃了娑葛的主力，而将余众（当以“黑姓”为主）留给了从北方夹击而下的毗伽可汗和阙特勤（敦欲谷本人则迅即南下索格底亚那了）。

由于毗伽可汗在bolcu一役所击败的主要是黑姓突骑施，随后与之周旋了许久的也主要是黑姓突骑施，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战场boleu处于黑姓突骑施的势力范围内，当是其主要根据地之一。按《新唐书·突骑施传》，苏祿部属于黑姓突骑施，而苏祿当初又是车鼻施部落的首领。足见黑姓即使不完全等同于车鼻施，也与之关系密切。车鼻施即是车鼻。车鼻施属于“突骑施别种”，突骑施本身则是“西突厥别部”；而车鼻系“突厥别部，亦阿史那之族。”说来话去，车鼻施和车鼻都是阿史那突厥的一个部落，最初很可能为同一实体。另一方面，就语音而言，若确如缪莱所言，车鼻的语原是cabis（义为“监视者”），那么它也可以作为“车鼻施”的语原。因为古代汉人对于外来词词尾的流音有时译出，有时则略去，例如tolis，则兼可作“突利失”或“突利”。按新、旧唐书《突厥上》车鼻部落在贞观时期地居金山（即阿尔泰山）之北。但是，该部在经历了650年被唐廷迁往于都斤山、657年归其所居基”，以及二十年后突厥的大规模扩展领土后，其居地一或者其部分成员的居地——有所变动，是完全可能的事情。《新唐书·葛逻禄传》说葛逻禄“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暗示了车鼻部即在多怛岭（今塔尔巴哈台山脉）附近，甚至可能在塔尔巴哈台山脉之南。假若再从车鼻施部与突骑施、葛逻禄都曾有过密切关系这样一个史实来考虑，那么将车鼻施部——亦即黑姓突骑施——的主要居地置于突骑施辖境的北方，即塔尔巴哈台周边地区是适当的。

四、yaris平原即雅尔河流域

至此,我们可以在塔尔巴哈台地区内来探寻战场bolcu的位置了。按敦碑,yaris平原即在bolcu附近,故我们同样可以在塔尔巴哈台地区寻找yaris的踪迹。

《西域图志》卷十一载云,雅尔河在塔尔巴噶台西北二百里,其地“土壤膏沃,水草滋丰”。塔尔巴噶台,也作塔尔巴哈台,即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塔城。雅尔河实际上位于城的正西方。它发源于塔尔巴哈台山脉,直南而下,注入阿拉湖的北岸。我们可以看到,塔尔巴哈台山脉呈东西走向,其南麓与阿拉湖、萨司克湖之间夹着一块狭长的平原,平原上不仅流有雅尔河,还分布着额敏河、博勒济尔河、喀喇河等大小源自塔尔巴哈台山脉的河流和溪泉。所以,不但是雅尔、河流域“水草滋丰”,实际上塔尔巴哈台山脚下那片狭长的平原也是水草肥美。这块东西三、四百公里,南北一百多公里的地区实在是游牧人最佳的牧场。敦碑说,突骑施在yaris平原上集结了“十万大军”唐廷景龙四年(710)夏所发的《命吕休源等北伐制》中则说,突骑施守忠(即娑葛)所领的“诸番部落兵健儿”为二十五万。即使两条史料都有所夸张,而突骑施在yaris平原上集结了大量军队这一事实,则是无可怀疑的。而上文论及,突厥与突骑施军队的相持阶段达一年左右。所以,要容许如此庞大的军队(当以骑兵为主)维持如此长的时间,这一yaris平原就必须具备广大的面积和丰盛的水草。塔尔巴哈台山脉南麓的平原恰好符合这一基本前提。这是可以将yaris平原置于雅尔河周围地区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在于语音方面。在突厥语中,名词yar-(ya: r-)具有“某物被劈开后所造成的状况”之义。例如,由于水流浸蚀而形成的陡峭河岸,或者因水流的作用而生成的穿劈山脉的峡谷,均可称为yaro。yar-作为动词,则有“(用尖锐的器具)劈开”、“分开”、“划分”以及诸如此类的含义。一条发源于高山,尤其是呈南北走向,将狭长的平原拦腰切断的河流被人们称之为yar,是十分自然的。所以我认为,由于音、义都甚吻合,突厥语yar就很可能确是汉语“雅尔”的语原。

当然,yar与敦碑中的yaris还存在着语音上的差别。但是我们注意到,在突厥语中,后缀-is加在某些动词的词尾上后,可衍生成另一个含义相仿的名词。于是,从动词yar-就衍生出了另一个名词yarish喀什噶里在其《突厥语大辞典》中把它解释为“(在两人的财产之间的)划分”。再从yarish衍生的名词或形容词yarshl:则也有“划分某物”的意思。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yar、yarish还是yarshl:都具有类似的含义:分割或划分。那么,如果我们所说的这条河流由于从塔尔巴哈台山脉穿劈山谷而下,并横贯了狭长的平原,因此被命名为yar、的话,它也可以因为同来的特色而被称为yarish或yarshl:换言之,在突厥人看来,yar和yarishl或yarshl:指的是同一条河流。既然如此,与之语音十分吻合的yaris平原也就很可能是指雅尔河流域了。

这里尚有一点小问题需要解释一下。汤姆森将河名转写成yariš，马洛夫则转写成Jaryš；即对于最后一个字母，前者作腭音š（=S=sh），后者作齿音S。二者之间有何关系？汤姆森认为，S在有些词中可以代表š，所以就往往互换地使用。马洛夫则认为，在古突厥语中，S音可能只存在于书面语言中，通俗语言中则只发š音；易言之，二者实际上是相同的。有鉴于此，我们似乎可以将上文提及的yariš、jarys、yaris或yarish视为等同了，亦即是说，无论如何转写，敦碑中的yaris都可以确切地对应于雅尔河。

另一个小问题是关于其汉译名。岑仲勉认为此河即是萧嗣业追击贺鲁时抵达的“邪（耶）罗斯川”，故直接以“邪罗斯”称呼之。实际上，《唐书》中所提及的那条河应该是“怛逻斯（即今塔拉斯）”，史家只是误用了“邪罗斯”一名。关于这点，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早已指出。既然“邪罗斯”仅见于唐军追击鲁贺的史料中，而该河实际上又指的是怛逻斯，所以我们不宜将yaris译成汉名“邪罗斯”，而宜按现代音译法，作“亚里斯”，以免误指之虞。

于是，可得出如下结论：敦碑中提及的突骑施集结十万大军的亚里斯平原即是塔尔巴哈台山脉以商，后世称为雅尔河的流域及其附近。

五、bolcu即博勒济尔河

一旦亚里斯平原的位置得以确定，bolcu也就比较容易比定了。从敦碑叙述的语气来看，突骑施的大军驻地距前方战场bolcu显然相隔不远，所以bolcu亦当位于塔尔巴哈台地区。把bolcu指为塔尔巴哈台商麓平原上额敏河的右翼支流博勒济尔河是适宜的。具体理由如下。

甲，上文业已指出，亚里斯平原和bolcu地区应该是突骑施人的主要牧放地和根据地之一。而通常说来，游牧人的根据地不但必须具备丰盛的水草，还必须具备良好的自然屏障，以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综观游牧人的许多主要根据地，几乎都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其中绝大多数均依山傍水，可以拥险自保。突厥人的大本营在于都斤山，据有鄂尔浑河上游和南北塔米尔河流域，南有杭爱山脉，北有杭爱山北麓支脉乌哈一乔卢托伊等山脉。黠戛斯人则以曲漫山，即今西萨彦岭作为南方的屏障。回纥初据姿陵水（今色楞格河）上，北有纳姆山地，南有布林乌拉山脉等，也在群山环抱之中。即使默啜时代的后突厥政权野心勃勃，它在西部通常也只以阿尔泰山为界，不敢随便深入山脉以西的平原地区。敦碑载云，突厥可汗得知突骑施人集合了大军之后，便很谨慎地命令突厥部队以阿尔泰山为屏障，静候形势发展。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游牧人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都十分注意利用天然的地理环境。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认为,当突骑施屯驻大军等待战机时,是不可能长期呆在无险可守的准噶尔平原上的(犹如吉罗所主张:亚里斯平原即准噶尔平原),也不可能将一座城市作为固守的主要据点(吉罗认为bolcu乃是一座城市,相当于今之福海),因为我们难以设想公元8世纪的游牧人突骑施会试图——或者能够——凭借乌伦古河河口的一座孤零零的设防城市来阻挡从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那一边入侵的大量突厥人!一个更为合理的推断是:突骑施人所驻扎的亚里斯平原和bolcu都处于一块拥有自然屏障的攻守兼备的根据地里。塔尔巴哈台南麓的平原便符合这一条件。该地区的北界为塔尔巴哈台山脉,南界为萨司克湖、阿拉湖和巴尔里克、柴尔等山脉。更妙的是该平原地区的东部还有一座鄂尔和楚克山,位于博勒济尔河的东方约50公里处,并几乎与河流平行,呈南北走向。这样的山和水仿佛成了平原地区的东大门?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尽管它们并非险峻到足以称为“天险”,但是至少要比广阔的准噶尔平原更不容易遭到来自阿尔泰山另一侧的攻击。博勒济尔河西距雅尔旧城(肇丰城,当今乌尔扎尔)约300余里,也就是说,与雅尔河流域相距不远,完全可以相互呼应。所以,这一地区可能正是当时突骑施在东北方的最前沿阵地,似乎也是用以对付来自阿尔泰山东(北)侧的突厥人的最理想驻地。

乙.就语音而言,博勒济尔和bolu十分吻合。以“博勒”译“bol-”,完全没有问题,只是以“济尔”对“-cu”,似乎不尽贴切,因为“尔”字没有着落,所以对此需作一点解释。在古突厥语中,yul一词义为泉水、山溪、小河等等,此义迄今还残存于突厥语东北方言群的卡查语、克孜尔语和科伊巴尔语中。yul音译成汉文,便是“裕勒”或“裕尔”。它可以置于河名之前,也可以置于河名之后,意思都是“××河”。例如,上文提到的雅尔洞就又名“裕勒雅尔”或“雅勒裕尔”。所以我认为,“博勒济尔”即是“bolcu yul”的汉文对音,由于-u和yu一音近,二者连读,便不易分清两个音节,从而在汉语中略去了“裕”字,使本该读作“博勒济裕尔”的河名成了“博勒济尔”。有一个事实能有力地证明“博勒济”可以单独成为河名:就在距博勒济尔河不远的额尔齐斯河右岸,有一支流名为博勒济(博喇济)。当然,它不可能是我们在此讨论的bolcu,因为碑文所说的bolcu是在突厥人渡过额尔齐斯河以后才抵达的。也许,bolcu或bolcu yul就象kara kum(突厥语“黑沙”或zagan tologoi(蒙古语、“白山”)一样,只是个普通地名,到处使用着。

丙.将bolcu比定为额敏、河右翼支流博勒济尔河,能很好地吻合于碑文中关于此战的细节描述。按敦碑,敦欲谷与突骑施相持了一段时期后,越过阿尔泰山,渡过额尔齐斯河,经过了决不止一天的日夜行军,在bolcu与突骑施展开了激战。敦欲谷肯定选择了最便捷的道路。而按今天的交通来看,要从阿尔泰山另一侧的今蒙古人

民共和国的科布多市（那里相当于突厥军队屯驻之处）西赴我国塔城地区（那里相当于突骑施屯兵的亚里斯平原），十分通常和便捷的路径是：取道代茵湖，翻越阿尔泰山的乌尔穆盖图山口，然后西经阿勒泰，至福海，沿着绍尔山脉（Saur，其南坡的中段与塔尔巴哈台山脉的东端衔接）南麓的通道西进，并通过塔尔巴哈台东段南麓与鄂尔和楚克北端之间的山谷通道进入额敏河上游——亦即进入塔尔巴哈台南坡平原地区的“东大门”。组成这“东大门”的主要河流正是博勒济尔河。因此，敦欲谷如果要进击驻扎在亚里斯平原上的突骑施人，似乎必然要先与扼守在天然屏障博勒济尔的突骑施前沿部队发生冲突。从敦碑第39行“第二天他们[又]来了”一语来看，亚里斯平原上的突骑施援军显然在一天后即抵达了bolcu前线，可见两地相隔颇近。若以博勒济尔河流域至雅尔河流域的距离来计算，是十分符合碑文的描述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将敦碑、阙碑、毗碑中提及的突厥与突骑施交战的主要战场bolcu比定为博勒济尔河流域是比较合理的；而将突骑施屯兵的主要据地yaris平原定在雅尔河流域也是可信的。总而言之，两地都位于今塔尔巴哈台山脉南麓的平原上。